

2009 區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吳進喜*、陳鴻圖**

一、前言

近年來，區域史的研究已被視為逼近歷史現象或問題的另外一條進路。區域史是使用「區域」的方法，在一個地方的開發過程中，整體性地掌握一地人民生活全部歷史的一種研究途徑。研究者在討論區域開發歷史所採取的研究方法，通常依據特定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為指標，而將地表空間劃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區或區域，然後針對區域內的各種相互關聯現象，包括自然環境的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動的人口、經濟、交通、聚落、政治、社會、文化等，進行整體性的歷史探討。通過區域史的研究途徑，在具體空間脈絡下逐步重建的歷史面貌，依賴從各地抽離區域脈絡彙集而成的歷史材料、進行綜合性研究而描繪的所謂「整體」歷史面貌。其研究成就是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大多數年鑑學派史學或新社會史所標舉的「總體史」研究之具體表現，如黃宗智的「農業過密化」、施堅雅的「區域經濟系統」等，皆是史學研究托足於「區域」所獲得的成果。

這種研究途徑，不但使跨學科交流成為必要，資料的種類和來源也大為拓廣，而且也使田野調查成為可能。區域史的實證研究者，大多能夠體會這種研究途徑在歷史研究方法論中的獨特性。例如「華南學派」學者劉志偉主張：「人類是在一定的空間中創造歷史的，如果沒有對於空間歷史的認識，我們解讀的歷史就只能是一條單純的時間線索。」鄭振滿也認為：「為了直接體驗空間的歷史，我們就親自到文獻中所記載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調查。」通過區域史的研究進路，可以探尋歷史的普遍性、規律性，也可以凸顯特殊性、獨特性；究竟走向何方，取決於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研究設計和現世關懷。

區域史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地理學的區域研究，從整體的角度探討當代各種地理現象的方法。作為一種方法或方法論，區域開發史解讀或探討歷史的途徑，基本上是將歷史現象置於具體的時空座標上，也就是將歷史現象放回它產生的區域（空間）脈絡中加以審視，並經由掌握該區域範圍內歷史現象的同時性、貫時性縱橫交織而成的各種具體關係，再逐步深入的探討相互關連的歷史現象，與問題的形成過程、機制和意義。

由於從空間的角度構思議題，不僅增廣了研究者的視野，也使觀察問題的眼光更為敏銳。因此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區域史的探討一向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究其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因有五：一是區域史的對象，不論是自然空間或行政空間界定都比較明確；二是從清領以來地方行政文書的保存相對完整，如《淡新檔案》、地方志等；三是相關系所不論在發展方向或課程開設上，區域史均有一定份量；四是從事區域史研究，在情感上較為親切，方法上田野調查和口述歷史的運用，對剛接觸臺灣史的研究者較具吸引力；五是以學位論文來說，從事區域史研究的論文大多是在職專班的中小學教師，基於基層教師的使命感和方便田野調查，區域史的研究論文因而較多。

2009 年臺灣區域史的研究成果，總計有 66 種。根據這些論著所探討的空間，基本可以概分成爲：南部、中部、北部、東部和離島、全島範圍但具區域特性等五類，由陳鴻圖負責北部、東部和離島、全島範圍但具區域特性等 30 種論著的回顧，由吳進喜負責中部、南部及澎湖共 36 種論著的回顧。依地理特性和歷史發展，北部地區又可分成臺北盆地、桃竹苗地區；東部和離島可以再分爲蘭陽平原、花東、離島三個地區。

二、北部地區

2009 年出版的北部區域論著計有 14 篇。首先，以論著性質來看，一般論文有 9 篇，學位論文有 5 篇，5 篇學位論文中 4 篇都是以桃竹苗爲探討對象，可見過去被視爲沿山的「隘區」，是近年很吸引人研究的對象。其次，以探討地區來看，臺北盆地有 9 篇，桃竹苗地區有 5 篇；最後，就討論的主題是來看，以河運（及水利）和區域發展、族群和聚落、區域變遷三個面向的探討最多。

（一）河運、水利與區域發展

關於河運和臺北盆地的關係，黃富三在〈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文中，從交通的角度論述淡水河水運與關渡興衰的關係。淡水河是臺北盆地發展的命脈，其無數河流提供豐富的水源，宜於產業發展；加上淡水河終年可通航，將上下游連成一氣，可形成一經濟圈。因此沿岸出現許多聚落，關渡即其中之一，早在史前時代即有原住民聚落。十八世紀漢人大量移居後，關渡更因位於淡水河出海口，扼河運之要衝，關渡乃中繼站，設有海關檢查哨；1875 年臺北設府與 1885 年臺灣建省後，又成爲防衛府城或省城的軍事要地，築有砲臺並駐軍。因此，關渡成爲鄰近聚落的小型中心市場，包括忠義、北投、竹圍及關渡埔頂，因而出現一條龍式的關渡街。然而，日治後淡水河水運由於淤淺與基隆港之取代淡水港而衰落了，關渡失去河運中繼站的地位；新建之淡水線鐵路、公路線又遠離舊街區，乃淪爲一寂寥的小寒村，鄰近之北投則取而代之。綜上，關渡是反映淡水河水運興衰及其影響的典型案列，此亦顯現臺北市由河岸往盆地中央移轉與由點而面的歷史軌跡，深

具比較研究意義。¹

同樣位於淡水河流域的新莊，其過去的重要性都不若艋舺，杜武志在〈談「一府二鹿三新莊」之所由來（一）：新莊古今談〉文中，藉由參與新莊市公所舉辦的「過盡千帆話新莊」的導遊研習活動，而聽聞「一府二鹿三新莊」的發想，且在舊報紙、《臺灣民族性百談》及田野調查等史料上，得到對此一名詞的印證。因而，欲推翻一般大家所耳熟能詳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本文在一開始及闡明其認為早在嘉慶末年，新莊曾經是臺北平原的農、商、行政、文化中心。本文雖提出此新穎的看法，但缺乏嚴謹史料的佐證，大多是自身在日治時期的記憶和經驗，可討論的空間仍相當大。²

淡水河流域雖具河運功能，但也可能阻隔臺北盆地聚落間相互的往來，李進億在〈臺北橋的興建與三重埔的區域發展（1889-1945）〉文中，就認為臺北橋的興建對三重埔的影響甚鉅。首先，論及在清代及日治中期以前淡水河的水運主宰了臺北盆地的客貨運輸，與臺灣南部形成不同的交通形式「北船」。在此情形下，淡水河下游的對渡水運雖屬發達，但渡船確有其不便之處，橋樑有其必要性。其次，將劉銘傳為開築臺北到新竹間的鐵路所搭設的鐵路橋—「淡水木橋」做為臺北橋的前身，說明至 1925 年臺北橋重建完工為止的歷代臺北橋興建的歷程。最後，則分別就交通速率及運量的躍升、地價的上漲、商業發展的繁盛、觸發都市計畫的開展及渡船業的嚴重衰退等面向，探討臺北橋興建後對於三重埔區域發展的具體影響。作者認為 1925 年第三代臺北橋的正式通車，帶給淡水河下游地區兩岸的居民強烈的安全感，並且深深影響在日治時期初期發展不如大稻埕而擁有許多荒地帶開發的三重埔地區。³

除河運外，水利開發一直是區域發展很重要的課題。李宗信等的〈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一文，指出今日所謂的瑠公圳，包含清代先後由民間所興築的霧裡薛圳、瑠公圳、大坪林圳三大圳，以及圳道流經串接的大小埤塘。這些圳道和埤塘，原本各自維繫著不同人群的生業命脈，是臺北平原社經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在日治及戰後漸次被合併、改修或填埋，逐漸消逝於都市化的洪流中。本文以 GIS 為輔助工具，將大量水利相關契約、檔案及地圖整合於時空座標中，重現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臺北平原圳道的動態樣貌，並藉此考察其沿革與發展。本文亦提出「水利共同體」、「水利秩序」等歷史問題，並將其置於社會史、環境史等研究脈絡中加以論述，而認為三大水圳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凝結不同聚落、人群及社會，形成了各異的水利秩序；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河川上游的開發，造成環境變遷，挑戰了原本「人一水」、「圳主—埤長—引水者」間的關係，造成就有水利秩序之漸趨瓦解。本文結合新科技與史料，重建瑠公圳的演變

¹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水運與關渡之興衰〉，收入黃富三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83-144。

² 杜武志，〈談「一府二鹿三新莊」之所由來（一）：新莊古今談〉，《臺北文獻》，170（2009.12），頁 217-252。

³ 李進億，〈臺北橋的興建與三重埔的區域發展（1889-1945）〉，《臺北文獻》，167（2009.3），頁 115-146。

史，呈現自然與人文間的互動過程，深具意義。⁴

傅寶玉在〈水利與國家：日治初期桃園廳公共埤圳的公法人化〉文中，本文以《臺灣總督府檔案》史料為中心，通過日治時期桃園廳公共埤圳規約制定及修正，探討水圳私有權發展為國家監督管理的公共埤圳公法人化之過程，藉以檢視殖民權力對臺灣社會的介入模式之一側面，以及臺灣水利發展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文中指出透過公共埤圳的施行，顯現了殖民政府對地方社會權力的伸張，而公共埤圳公法人化，配合田租的廢大租戶制後，在地地主因此間接受益，促成在地家族勢力的興起。雖然殖民權力的介入改變了地方社會結構，但水資源透過國家力的運作逐漸由少數擁有到多數人享用，卻也帶來了正面的影響。本文以桃園廳公共埤圳為討論對象，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水資源控制權的改變；（2）水租徵收之標準及方式的改變；（3）埤圳之興廢無論大小皆須報官核准；（4）當政府認為有必要時，亦得以收購人民土地；（5）人民於水利上發生糾紛時，一切由官廳調停，不得向司法機關提請訴訟；（6）大範圍發揮水圳的灌溉功能。⁵

（二）族群和聚落

沿山聚落的探討，是近年區域研究最受矚目的對象，2009 年有三篇碩士論文探討桃竹苗近山地區。首先，莊育忠的〈區域拓墾與族群關係：以霄裡社為中心〉一文，以歷史學的時間脈絡為主軸，利用《淡新檔案》等史料和實地踏查的方式回溯霄裡社地權所在的區域，瞭解霄裡社與鄰近族群的互動關係。霄裡社所在區域是桃園地區開發較晚的地方，而生活在這裡的霄裡社是什麼原因消失？在漢人移民中，這裡的閩粵族群維持著整樣的局面？在國家權力進入後，又形成怎樣的移墾社會？上述這些問題是本文所要討論的要旨所在。透過此區「番大租」的相關契約文書，闡述霄裡社在番屯制度實施後，如何藉此積極開拓土牛溝外的土地，及還原其生活樣貌，並探討面對漢人越界拓墾，及國家力量介入後墾佃關係的改變。本研究在時間斷限上，大致以清朝為主，偶有述及荷西時期及日治時期為輔。空間範圍則界定霄裡社所在位置位於番子寮臺地、店仔湖臺地與銅鑼圈臺地，為桃園臺地的一部分為研究的區域範圍。⁶

再者，許世賢的〈劉銘傳裁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為中心〉一文，討論在國家與地方互動的框架下，1886 年劉銘傳執行裁隘對竹苗地區隘墾社會的改變與影響，以瞭解晚清時期清政府如何運用國家力量處理臺灣地方事務。本論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一、劉銘傳執行裁隘時忽略民間傳統習慣與現實考量；二、裁隘使隘墾社會內部業佃矛盾問題得以正視；裁隘使國家力量得以介入有效管理隘墾社

⁴ 李宗信、顧雅文、莊永忠，〈水利秩序的形成與崩解：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期瑠公圳之變遷〉，收入黃富三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145-228。

⁵ 傅寶玉，〈水利與國家：日治初期桃園廳公共埤圳的公法人化〉，《國史館館刊》，20（2009.6），頁 1-38。

⁶ 莊育忠，〈區域拓墾與族群關係：以霄裡社為中心〉，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

會的發展；四、劉銘傳去職後「人亡政息」的現實。⁷

最後，甘國賢的〈苗栗縣墾拓與族群互動之原漢界面歷史空間調查研究〉一文，係探討從清代到戰後苗栗縣境內族群互動之變遷歷程。針對原漢關係的變遷，作者將其運用統治者角度大致分段為四大項：一是自明鄭時期的屯墾來防守漢番邊界，然作者雖有提出本階段的論點，但在文章中並未詳細說明，似互無法佐證；二是自清朝以來的漢番邊界的變化，象徵著從設置邊防隔絕原漢的番界到打破邊界的開山輔番，都是在說明從晚清開始，原漢的關係從消極阻隔轉進到積極進入；三是到日治時期則是更加積極，爲了取得山區的資源，日人更大舉擴張隘勇線，並逼迫原住民進入其規定居住處，爲國家力量進入的表現。在戰後仍就在兩岸問題背景之下，國家力量仍舊深入到原住民的範圍。從以上重點帶出本文所說明的，各階段之統治者，不論是隔離的界線，抑或是強力介入的統治力量，都說明著原漢之間不平等的關係與際遇。⁸

黃雯娟在〈日治時代北投地區的區域發展與社會網絡〉文中，以「地域社會」爲核心概念，探討日治時期因溫泉而發跡的北投，其行政空間與社會網絡之關係。北投區，是一個位於大屯山腳的行政空間單位，此一地區的發展與陽明山地域關係密切。因此作者透過區域發展歷程、環境及國家經營的角度去釐清：當地土地、資源、產業與社會網絡的關係，得到五點結論：一是環境是區域聚落發展的重點關鍵；二是開墾之區漢人與平埔族聚落的重疊，顯然與相同的維生方式有關。三是北投街的興起與硫磺溫泉產業密切關聯；四是產業帶動聚落的形成，也影響人口遷徙；五是日治時代國家透過行政空間的建構，將區域空間結構爲街庄民、警察官及部落民三層空間，這三層空間，不但層次分明，界限清楚，而且統合內疊，成爲國家深入民間、行使權力的管道，事實上地方社會的各個組織亦利用這樣的空間進行各種政治、經濟及社會活動。⁹

竹北雖不是沿山聚落，但在高鐵興建後，卻是一個快速變遷的聚落。吳歆婕的〈竹北市的聚落發展與變遷〉一文，以「聚落型態的原型/維持型」及「成長極」兩概念爲基礎，論述竹北地區長時間的聚落發展與變遷。日治時期縱貫鐵路的興建、1970年代工業園區的設立、1980年代被選定縣治所在地、及近十年高鐵的通車，是讓竹北變遷最重要的四個關鍵時期，在縣治特區及高鐵特區兩項重要政策的影響及帶動下，使竹北市迅速從農業鄉鎮轉變爲現代化的都市。¹⁰

除族群外，家族地是區域發展另一個重要的關鍵。黃啓祥的〈林平侯家族與大溪板橋之開發〉一文，旨在探討林本源家族在板橋、大科崁地區的發展，透過對板橋及大科崁地區自然環境與漢人墾殖前的人文環境的瞭解，進一步討論林本源家族是如何在移民社會中發展、落地生根及對當地的發展是否有所貢獻。研究範圍以林

⁷ 許世賢，〈劉銘傳裁隘之研究：以竹苗地區的隘墾社會爲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9。

⁸ 甘國賢，〈苗栗縣墾拓與族群互動之原漢界面歷史空間調查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⁹ 黃雯娟，〈日治時代北投地區的區域發展與社會網絡〉，《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1-30。

¹⁰ 吳歆婕，〈竹北市的聚落發展與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

本源家族所開發的地區為主，包含板橋、桃園大溪和噶瑪蘭等地；時間斷限則從 1781 年林應寅遷移到新莊開始至 1862 年林國芳去世為止，其間包括林平侯、林國華、林國芳二代的人物。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在林家發展及遷移的過程中，大大的開發了大科崁及板橋地區，也許林平侯的本意，只是想賺大錢幫助自己的家族，在未來可以站穩腳步，卻不知道這樣的開發除了使家族成爲臺灣首富外，亦意外的帶動了這幾個地方經濟的發展。¹¹

（三）區域變遷

尹章義不同於眾多以戰後經濟發展爲探討主軸的論述，在〈從堯天舜日的荒埔到臺北、新北兩大直轄市：臺北三百年發展史綱〉文中，嘗試從清代臺北發展之始，說明臺灣北部之所以可以快速發展的原因，作者認爲臺北盆地之所以可以塑造兩個直轄市始於「五家族三墾號」透過通事的仲介，又計畫的投入大量資金和人力，大規模、全面性的開墾。加之全臺第一港及淡水社船的協助，使臺北盆地的腹地不斷過大；及墾首利用山泉水建埤、建塘、設汴、鑿渠分流，以資灌溉，又在雍正、乾隆初年興起開鑿大圳、整合小圳的水田化風潮，都是造成北臺拓墾運動蓬勃發展的基本條件，亦使得臺北的開發比起西部臺灣更加快速。¹²

黃武達的《日治時代臺北市近代都市之建構（1895-1945）》論著，提出都市計畫是勾勒一個都市發展的藍圖，臺灣之都市近代化肇始於劉銘傳撫臺時期，1895 年臺灣成爲日本之殖民地以後，更以「市區計畫」爲主軸，首先以既成之市街之地區爲目標，進行都市改造，即當時所謂之「市區改正」，從而重新開啓全面性、持續性之「都市近代化」運動。本書之目的即在透過日治時期建築相關法規的分析，試圖探究「市區改正」至「都市計畫」的發展過程，及與戰後建築法規的延續性，殖民政府在臺灣首創之建築法制，終其殖民統治爲止，施行 45 年之建築管理制度與法規之內涵，已深植於臺灣社會內層，在戰後臺灣重建的建築法制，法規的內涵與理念的傳承，仍有明顯之脈絡可尋，並促使戰後臺灣都市順利向「現代化」繼續邁進，以臺灣建築法制史之觀點而言，可謂深具歷史意義。¹³ 本書雖是以「臺北」爲名，且都提及臺灣的都市計畫始於臺北市，但全書係在探討建築法規對都市計畫的影響，對臺北市近代都市的建構反不若 2000 年出版的《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探討的細緻。¹⁴

徐茂炫等的〈光復後迄今北市各區人口興衰比較：1955-2006〉一文，不同以往對於人口的研究往往侷限於人口理論、某一地區或某一段時間的人口變遷，而是將不同時期不同地理範圍的人口資料，進一步的進行古今的比較，以便釐清光復後迄

¹¹ 黃啟祥，〈林平侯家族與大溪板橋之開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¹² 尹章義，〈從堯天舜日的荒埔到臺北、新北兩大直轄市：臺北三百年發展史綱〉，《臺北文獻》，170（2009.12），頁 7-38。

¹³ 黃武達，《日治時代臺北市近代都市之建構（1895-1945）》，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9。

¹⁴ 黃武達，《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0。

今臺北市各區人口變遷的原因。研究發現戰後臺北市的人口變遷有四個特點：一是印證了陳紹馨所提出的臺北市的居住人口從中心往外擴散的狀態；二是發現公共設施的興建與各區的人口成長趨勢相符；三是 1967 年北市升格直轄市及 1990 年行政區重劃的兩項政策，對各區的人口成長與變動有極大的影響；四是進一步以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與臺北市的人口成長相互比較，發現從在臺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臺北市的人口成長也由原本的逐漸變動到劇烈變動直至和緩的情形。¹⁵

三、東部、離島

2009 年東部地區和離島的論著總計有 9 種。就論著性質來看，9 篇中有 6 篇是碩士論文，一般論著 1 篇，專書是重印的《金門近代史》和研討會論文集《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就研究區域來看，蘭陽平原 2 篇，花東地區 3 篇，澎湖 1 篇，金門 3 種；就研究的主題來看，除 2 本專書外，探討國家政策和區域發展者有 2 篇，討論小區域開發史有 5 篇。由於蘭陽平原、花東地區和離島的金門、澎湖三個地區歷史發展歷程迥異，因此本文將依地區進行回顧。

（一）蘭陽平原

林宏仁的〈蘭陽溪南二結地區區域發展研究〉一文，旨在瞭解形塑蘭陽溪南的「二結大字」過去的各项條件或因素，及該地區區域發展的情形。研究主要關切二結地區聚落發展之三個面向，即（一）外在條件：地理環境對聚落發展之影響；（二）內在發展：二結地區聚落建立、發展，與地域觀念之形成；（三）地景變化：交通產業發展與聚落變遷之間的關係。¹⁶

張泓斌在〈大南澳地區的開路與移民開發（1874—1945）〉文中，試圖要探討大南澳本島人移民與交通的關係，並討論移民在大南澳的產業開發與族群關係，及移墾社會的種種樣貌，以建立大南澳完整的歷史圖像。討論的方向主要有二：一是日治時期大南澳本島人移民的性質是屬於官營移民或是私營移民；二是移民在大南澳地區的發展。本文結論指出大南澳地區的族群相當多元複雜，閩南人、客家人、平埔族、高山族、日本人等族群，都居住於這個交通受限、地形封閉的河谷平原中，但除了高山族與漢人之外，彼此之間並無隔閡而能相處融洽，國家的力量嚴密的控制著這片土地，宰制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權力，分配了各族群的生活空間，想要發生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是困難之事；加上大南澳的資源充足，族群之間彼此不用爭奪資源，還需要互相合作開發新土地，關係和諧是合乎情理的。此外，大南澳移民

¹⁵ 徐茂炫、李佳振、黃鈺中，〈光復後迄今北市各區人口興衰比較：1955-2006〉，《臺北文獻》，170（2009.12），頁 129-217。

¹⁶ 林宏仁，〈蘭陽溪南二結地區區域發展研究〉，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

純粹為經濟性質的移民，其宜民主體為本島人，與總督府所大力推動的日本人移民大異其趣。大南澳移民本質與官營、私營日本農業移民不同，只能稱為經濟性的官方輔導移民。從移民前從未精密測量土性，僅大致分配土地，也沒有規劃各種公共設施看來，是吃苦耐勞的精神讓大南澳的移民發展走上坦途，不僅移民就此長住下來，還吸引了更多人入墾。¹⁷

（二）花東地區

離開蘭陽平原往南的花東地區，在地理空間上具有封閉的特性，國家如何看待具此特點的「東臺灣」？此特殊區域性格的地域空間，聚落的發展有無特殊模式？邵偉達的〈國家政策與東臺灣聚落體系的演變（1875-1945）〉論文，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研究發現東臺灣出現花蓮港街、臺東街為首的雙核心網絡，以及內部發展差異下，所形成的區域分工與都市體系。結論則進一步指出，此時期東臺灣聚落的發展依舊身受到國家力量所影響；在國家的直接扶植下，新興的產業聚落得以在淺山丘陵與河灘地出現；而國家透過交通網絡的建構，更直接影響了原有聚落的發展。換言之，不同於開發較早的西部地區，其聚落體系隨著移民的開墾、加上交通與商業的發展，在清代以自然形成；此時東臺灣雙核心網絡與聚落階層的形成，深受國家力量所主導。在國家力量的支配下，東臺灣的聚落體系亦較過去更加強化。¹⁸

私人企業資本的引進東臺灣，即是國家政策主導東臺灣開發的重要政策之一。李禮仁的〈賀田組及其在東臺灣的開發：日治時期私營移民之個案研究(1899-1908)〉論文，即希望透過賀田組，探討日治時期由企業所主導的私營移民型態的進行方式，檢視資本家私營移民的成效及影響，最後呈現賀田組私營移民在日本當時移民背景中該有的定位。其研究目的有四：一、賀田組私營移民在日本明治時期移民的特殊性；二、賀田組移民與糖業、樟腦業的發展過程；三、賀田組移民事業失敗的檢討與評價；賀田組移民對東臺灣開發的貢獻。最後則觀察到，賀田組錯失於對東臺灣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評估，導致事業經營不理想，然而移民事業雖然失敗，但也對總督府後來的移民政策帶來啟發，也為臺東帶來進一步開發的契機。對賀田組而言，其移民事業只是為了發展自身產業的利益，與總督府的移民構想相去甚遠。本文雖詳實的探討賀田組在東臺灣的開發，但包括：賀田組與總督府的往來實情、賀田組移民與原住民間的互動情形、賀田組裡的日本移民與東臺灣日本人口的結構意義、賀田組其他人物如賀田以武在臺東糖會社及臺東拓植會社的實際活動情形等，是將來可以再延伸研究的課題。¹⁹

蘇祥慶的〈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論文，探討在行政體制中

¹⁷ 張泓斌，〈大南澳地區的開路與移民開發（1874-1945）〉，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2009。

¹⁸ 邵偉達，〈國家政策與東臺灣聚落體系的演變（1875-1945）〉，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¹⁹ 李禮仁，〈賀田組及其在東臺灣的開發：日治時期私營移民之個案研究(1899-1908)〉，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並不存在的「美崙」地名，作者認為「米崙」一詞的由來，較合理的說法應為緣起於居住當地的阿美族及撒奇萊雅族的用語演變而來，至於如何演變而來，作者並沒有詳加說明；另美崙空間範圍相當模糊，不空時期空間範圍亦不同。²⁰

（三）金門與澎湖

楊肅獻總編輯的《金門近代史》，原以研究報告形式於 2005 年呈現，2009 年金門縣政府重印出版。楊肅獻有鑑於近年來本土研究風氣雖然高漲，但嚴格意義的金門史研究卻仍付之闕如，具學術性的金門史寫作絕無僅有。因此，本書嘗試以 1922 年出版的《金門縣志》、1958 年的《新金門志》、1967 年的《金門縣志》和 1987 年的《增修金門縣志》的資料，結合新出土的《顯影月刊》、南洋協會臺灣支部的《福建省金門島概況》、《金門行政公署週年紀念特刊》、《戰地政務時期金門地區法規彙編》等資料，來重建金門現代史，其較為特別之處在於過去對金門史的研究無法清楚交代 1915 年-1945 年這一段歷史，本書藉由新的史料為此時期勾勒出一個大致清晰的面貌。²¹

陳益源編纂的《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本論文集乃是由「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集結而成。此會議的緣起是有鑑於「閩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之一，它承續了傳統的中原文化，也吸收多元的海洋文化，並形成特殊的僑鄉文化，深具豐富的內涵與獨特的魅力。由於閩南文化不只是一種地方文化，隨著閩南人的飄洋過海，落地生根，「閩南文化」早已超越省分國界，而在東亞地區形成一個龐大的「閩南文化圈」。換言之，「閩南文化」自有其族群、語言、文學、民俗、宗教、信仰、建築、藝術等多方面的特點，涵蓋範圍則遍及閩南移民所到之處，故理想的「閩南文化研究」應朝跨領域、跨國際的方向前進，始能真正認識「閩南文化」的發展真相與獨特價值。故在此研討會論集中，收錄的文章範圍甚廣，涵蓋了整個閩南文化圈的地域及各研究領域。²²

許志仁的〈明代海禁政策下的金門及其海域〉論文，擬從閩南小島—金門的研究，了解明代時期海禁政策對地方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首先從文獻上分析九龍江口外的金門海域，說明這一地區如何在中國的航海史上嶄露頭角，成為「東、西洋航路」或是「下南、上北通路」的交匯點，並且說明明初以來海禁政策的形成，以及各階段開海與禁海的發展。接著根據正史的記載，輔以田野的調查基礎，探討明代海禁時期，金門的相關地方防禦，諸如金門守禦千戶所、巡檢司以及周邊的相關水寨、遊兵汛防概況。再者從民間海上貿易的角度，嘗試辨析海商、倭寇與官紳的糾葛關係。並且針對嘉靖年間倭寇侵擾金門事件作一分析。最後，探討明代末葉政局與社會的紛擾，從明鄭的入守、到最後鄭氏的潰退，並且如何因為海禁遷界的

²⁰ 蘇祥慶，〈花蓮市「美崙」地區地名的形成與發展〉，《臺灣文獻》，60：2（2009.6），頁 237-268。

²¹ 楊肅獻，《金門近代史》，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重]。

²² 陳益源編，《2009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金門縣政府文化局，2009。

關係，造成金門史上氏族的重大播遷—史稱「癸卯之變」。²³

王國禱〈澎湖西嶼石滬之研究〉是一篇以地方產業發展為主軸，探討區域發展歷史的論文，作者以澎湖石滬數量最多的西嶼為地理場域，研究石滬形態的演變，探討澎湖石滬漁業的發展與變遷，以及石滬發展與變遷過程中，人地關係的建構及其間的關聯。透過文獻的整理，將澎湖石滬的發展分為：萌芽期、擴張前期、擴張後期、穩定期等四個時期，並利用石滬的空間分布、社會組織以及產業關聯等關係的比對，指出：一、西嶼石滬的分布，受居民生計行為與地理環境影響最為明顯。二、半漁半農的聚落，擁有較多的石滬，顯示石滬具有填補生計空缺的功能。三、石滬組織的宗親血緣關係對於移民社會具有安定的作用。²⁴

四、中部地區

2009 年出版的中部區域論著計有 11 篇。首先，以論著性質來看，一般論文有 2 篇，學位論文有 8 篇，專書 1 種。專書是國家圖書館出版「映象臺灣系列」之《日治時期的臺中》。就討論的主題是來看，2 篇論文聚焦於平埔族的土地租權變化，8 篇學位論文中，有 5 篇都是以區域開發與地域社會發展的關係為探討對象，是近年很吸引研究生研究的對象。

（一）平埔族的土地租權變化

自從柯志明的《番頭家》將邵式伯與施添福對於平埔族的地權變化的討論模式化以後，平埔族地權變化的研究進路日益明晰，吸引許多博士生投入此一領域進行研究。張家綸的〈清代臺灣南投社之地權流失與轉移〉一文，不同於以前的論文只討論番社遷徙前的地權流失，而是以南投社為例，根據文書與史料，更細緻地探討該社遷居埔里盆地之前與之後地權流失與轉移的背景與原因，並進一步根據土地契約形式的差異，推論居地自然環境差異，可能是造成南投社民維持土地共有或變為私有的主要原因。²⁵

李宗信〈日治初期崩山八社租權的地理歷史分析〉則以 GIS 為輔助工具，將日治初期「土地申告書」中所記錄的崩山八社土地租權狀態，作出完整的空間呈現，並依其租權形態的空間分布，將崩山八社的活動範圍，分為位於西南方的漢墾區、東北方的隘屯區和介於其間的番漢混墾區等三個「熟番租權區」。研究的結果指出，崩山八社的租權狀態，基本上與邵式伯在三峽所觀察到的案例較為接近，柯志明提出的「三層族群政治理論」在崩山八社區域內並不明顯。而透過三個「熟番租權區」

²³ 許志仁，〈明代海禁政策下的金門及其海域〉，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²⁴ 王國禱，〈澎湖西嶼石滬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²⁵ 張家綸〈清代臺灣南投社之地權流失與轉移〉，《臺灣文獻》，60：3（2009.9），頁 171-200。

的比較發現，漢墾區和隘屯區的租權轉移與流失，明顯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番漢混墾區因帶有熟番自耕之業的特性，反而成為殖民政府收買大租權之後，崩山八社僅存的社地。²⁶

（二）族群和聚落

黃素真在〈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圯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的博士論文中，從邊陲社會的概念出發，討論臺灣中部沿山地帶的竹山鎮大坪頂地方的文化歷史發展過程，從官方理番政策、土地拓墾進程、地方社會形構、南靖移民聚落與慚愧祖師信仰、地方產業發展等面向，呈現林圯埔大坪頂的多重邊陲特性，最後指出大坪頂地方社會，是複合了業緣、地緣、血緣及神緣等多重關係的社群結合。²⁷

邱正略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基於埔里盆地是清代臺灣平埔族規模最大的跨部落集體遷移目的地，平埔族在該地社會長期具有族群優勢地位，作者認為以此種條件觀察日本殖民統治對平埔族群的處境、社群關係演化以及地權優勢變化，應該具有重要意義。論文主要從考察埔里在殖民統治政策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入手，探討地方建設、產業發展與人口變遷，以分析國家、土地與人民間的互動關係，並運用戶籍資料，建構聚落內家庭關係的空間與族群網絡，透過政治、產業、社會組織、教育、信仰等，探討地方菁與家族在地方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地方發展的過程中，埔里市區街民生活的改變。²⁸

曾耀毅〈彰化伸港地區的區域社會及空間發展變遷（1683-1945）〉從漢人入墾阿東社地建立「德頤新埔十八庄」後，如何透過福馬圳六股支圳的水利建設，逐漸在彰化縣新港地區建立水田化的稻作農業社會過程，以解釋新港地區以一姓庄和主姓庄為主血緣性聚落形成的原因，並藉由漳泉械鬥的歷史，討論新港地區泉州籍人群集中及其與「新埔十八庄媽」祭祀圈形成的緣由。²⁹

余雅惠〈武東堡生活網絡形成之探究〉在說明漢人入墾彰化南投交界八卦山南段武東堡地域之後，如何透過交通、經濟、宗教、通婚等各項社會活動，形成居民在地的生活網絡。結果發現山區古道與步道的交通網絡，使武東堡內平原與山地居民不因地形的限制，而在經濟往來、宗教活動與通婚區域上有所聯繫，早在清代就已形成經濟、宗教及通婚生活網絡，而且生活層面上的各個網絡，皆與行政區相互重疊，是傳統社會居民實實在在的生活空間。³⁰

陳雍模〈清代彰化永靖地區的社會發展〉一文，旨在討論清代化永靖地區的開發歷程、人群衝突互動至邁向穩定與整合的過程，並探討永靖腔的形成。作者研究

²⁶ 李宗信〈日治初期崩山八社租權的地理歷史分析〉，《臺灣學研究》，8（2009.12），頁31-82。

²⁷ 黃素真〈土地、國家與邊陲社會：林圯埔大坪頂的地方性詮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9。

²⁸ 邱正略〈日治時期埔里的殖民統治與地方發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²⁹ 曾耀毅〈彰化伸港地區的區域社會及空間發展變遷（1683-1945）〉，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³⁰ 余雅惠〈武東堡生活網絡形成之探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指出永靖地區拓墾環境惡劣，故遲至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才有粵人的季節性移墾，而且一直到十五庄圳修築完成，將永靖地區的旱田轉化成水後，墾民才漸漸沿水圳定居下來，形成「連村」或「單路村」的條狀聚落。然而清朝頻繁的分類械鬥，一直使永靖地區的社會處於浮動狀態，直到 1860 年代戴案結束後，永靖地區實施聯莊保甲並成立帶有宗教性質的「七十二庄」組織後，社會才獲得安定與發展。而開發永靖的粵人所操之潮州話與饒平客話，在受到彰化地區強勢的漳州腔之影響，遂逐漸揉合成特殊的「永靖腔」。³¹

吳德停〈從岸裡大社文書中探討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從岸裡文書中篩選出有使用客家話詞彙者、有與客家居民之間的租賃借貸者、與客家居民之間有婚姻關係者、客家居民之間有合作或衝突關係者，藉此討論清代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研究發現由於客家墾戶將水利灌溉方式帶入岸裡大社，改變巴宰海族的生活方式並建立漢人社會中「業佃相依」的社會結構，因此岸裡文書中大約有 83% 的土地租賃契約以客家話詞彙書寫，而岸裡社民的經濟型態（營生方式），在與漢人社會接觸後，從擁有土地（作為商品），將土地出租獲取生活開銷及交稅所需，再加上過重的勞役，無法力田導致生活無著，而以抵押借貸，最終導致破產、他徙的困境。研究也發現岸裡社民與客家居民之間從無械鬥，合作修圳以及防範生番和盜匪是文書中常見的族群關係，但或許是礙於官方「禁娶番婦」的訓令，在契約中，只出現一件客家居民娶岸社女子為妻的文書。³²

孫秋茹〈戰後苑裡的經濟發展（1945-2007）〉，旨在論述戰後苑裡的經濟發展。作者透過觀察長時段的歷史發展，指出戰後苑裡的產業發展，是承襲清代、日治的經濟累積之成果，產業結構明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響，隨著臺中幼獅工業區的設立，產業結構逐漸由農轉工。而在臺灣工業升級及加入 WTO 之後，苑裡又隨著國家經濟政策，轉型成以精緻農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為主，將原本沒落的農業與手工業，結合休閒觀光，帶向永續發展的新方向。³³

（三）都市發展與都市計劃

王益斌〈臺中縣梧棲地區的都市化發展研究〉的論文，從日治時期的新高港規畫，到戰後臺中港建港的過程，討論梧棲地區的都市化發展，重點在檢視在臺灣現代化的脈絡下，重大建設與都市計劃對海港市鎮建設所帶來的改變與影響。研究指出位於臺灣中部的梧棲港，因遠離南北兩大港口而有位置的優勢，然而卻因為在陸上交通網絡的位置過於邊陲，內陸中心都市發展的優勢明顯高於港口，使梧棲二度成爲「有名無實」的發展，都市計畫因此流於形式，只能一再的檢討與修正。³⁴

³¹ 陳雍模〈清代彰化永靖地區的社會發展〉，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³² 吳德停〈從岸裡大社文書中探討平埔族巴宰海族群與客家族群的互動關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³³ 孫秋茹〈戰後苑裡的經濟發展（1945-2007）〉，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所碩士論文，2009。

³⁴ 王益斌〈臺中縣梧棲地區的都市化發展研究〉，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9。

何培齊在《日治時期的臺中》書中，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日治時期發行的明信片影像資料，作為臺中市城市建設的歷史見證，編綴而成一部城市影像歷史。作者將所使用的 170 餘張臺中市公共設施的影像，分為州廳建設、市區街町、教育文化、交通鐵道、工商產業、宗教寺廟、娛樂名勝等七大類，以呈現臺中市都市建設的整體面貌，種類雖然不如已經出版的臺北市和臺南市繁多，但作者認為這是館藏資料數量的反映，並非都市發展的真正差距，而且這些公共設施也已證明當時的臺中市已經創新作為一個當代都市的所有條件。此外作者根據持續編纂日治時期發行的明信片之心得，認為日本殖民政權發行明信片的目的是有三：一、為宣傳其殖民建設，二、宣導、教化國民生活需知，三、反映日本人的歷史思惟。³⁵

五、南部地區

2009 年出版的區域論著中，以討論南部地區的文章數量最多，計有 26 篇。首先，以論著性質來看，一般論文有 8 篇，學位論文有 17 篇，專書 1 種。專書是臺南縣文化局委託陳鴻圖研究的「嘉南大圳史料調查及蒐集」計畫之成果《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此外林玉茹與曾品滄的三篇文章，出自林玉茹編輯之《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論文集，該論文集也是臺南縣文化局的委託案「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研究專案中，歷史報告的部分。就討論的主題是來看，有 3 篇論文和一本專書聚焦於河運、水利與區域發展，2 篇一般論文及 4 篇學位論文在討論族群和聚落的議題，1 篇一般論文及 2 篇學位論文以家族與區域開發為主題，1 篇一般論文及 6 篇學位論文在分析地方產業與區域變遷的關係，2 篇學位論文關注區域開發與社會變遷，1 篇一般論文及 2 篇學位論文在處理城市建設或都市計劃。

（一）河運、水利與區域發展

林玉茹〈導論：地方性港口市街史研究〉，曾品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與林玉茹〈麻豆港及其市街的變遷〉，等三篇文章，是林玉茹編輯之《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論文集的導論與二篇論文，該論文集為臺南縣文化局的「水堀頭遺址探勘試掘暨舊麻豆港歷史調查研究報告」研究專案中的歷史報告部分。³⁶

林玉茹在該書的〈導論：地方性港口市街史研究〉中，除介紹書中論文的簡要內容外，並且指出：19 世紀以前臺灣的港口眾多，每個港口各自承擔其腹地的人員、

³⁵ 何培齊《日治時期的臺中》，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

³⁶ 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貨物與資訊之流通，猶如瞭解各地域社會的窗口。「一府二鹿三艋舺」是長期以來臺灣港口史研究的焦點，規模的較小的地方性港口，如麻豆港者較少被注意。由於麻豆地方人士極力保存地方文獻資料，包括原住民、家族與地方開拓史料都相當豐富，才有辦法配合水堀頭遺址的考古試掘，大受重現麻豆港街的歷史變遷。而麻豆港街的故事，不但反映大航海時代臺灣原住民部落受到西方勢力的影響與變化，也反映臺灣史上的漢番競爭與移民拓墾歷史，特別是麻豆如何由原住民聚落轉變成港口市街的過程，甚至連在地家族的發展、產業經營、士紳化皆與其他地方不同，所以地方性港口史，不只是鄉土史，對於整體臺灣史的理解也別具意義。³⁷

曾品滄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論文，旨在探討 17 至 19 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的過程與特色。文中作者論述漢人移民在面對具有書寫能力且武力強大的麻豆社民時，取得土地進行拓墾，並在原住民生活習慣與多變的自然環境下，建構麻豆獨有的市街型態，即由麻豆社傳統多檳榔宅的所謂「一畝檳榔一草堂」，發展成具備八個乃至十二個「角」的市街。論文指出麻豆社人自 17 世紀初與外人接觸時，即以武力強大著稱，後來又向荷蘭人學習羅馬文字，具有書寫能力。漢人的拓墾活動遲至乾隆時代才逐漸從麻豆社的邊緣向中心（番社社址）挺進，並掌握麻豆地域的主導權，發展各種產業。本末倒置過程不僅漫長，且處處充滿原漢之間的妥協，以及漢人對於臺灣西南部多變的自然環境之高度適應能力。整體而言，漢人在麻豆地域的拓墾，受到麻豆社強大部落力量以及西南沿海自然環境迅速變遷等兩個因素的制約。在麻豆社民離開之後，其遺留的生活方式與居住模式，仍然對麻豆街的聚落型態與產業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³⁸

林玉茹的論文〈麻豆港及其市街的變遷〉，在研究作為麻豆地域吞吐口的麻豆港的港口貿易，與麻豆市街開發的關係，特別是河港型的港口市街如何由麻豆社控制，轉變成為一漢化市街的過程。文中作者利用豐富的文獻和地圖詳細考證麻豆港的位置、港口貿易的發展和市街的變遷。麻豆港自有紀錄以來，一直是倒風內海中的重要港口，與鐵線橋港、茅港尾港連成一氣，總海口在魷港，早在荷蘭人之前，就有與漢人交易的記錄。清初在港口所在的水堀頭設置汛塘，加上位居南北官道要衝，水堀頭成為麻豆地區最早的漢番貿易據點，由麻豆街寺廟與早期的公共設施大多興建於乾隆中末葉，可知 1770~80 年代應是麻豆港的發展巔峰。或許是為了避開水患及漢番勢力的交替，其後的麻豆地區的商業中心，才由水堀頭逐漸往西轉移至麻豆社原社址所在。至於麻豆社民因與外界接觸，從生活各個方面觀察，皆較其他地區의 平埔族群更具競爭力，與漢人接觸時並非處於絕對劣勢，因此直到乾隆時代，在麻豆地區漢番比鄰而居的現象十分普遍，麻豆社勢力的存在大社聚落中「檳榔宅」的格局，因此影響麻豆市街的聚落型態，形成罕見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³⁹

³⁷ 林玉茹〈導論：地方性港口市街史研究〉，收入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頁 18-29。

³⁸ 曾品滄〈從番社到漢庄：十七至十九世紀麻豆地域的拓墾與市街發展〉，收入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頁 82-137。

³⁹ 林玉茹〈麻豆港及其市街的變遷〉，收入林玉茹編，《麻豆港街的歷史、族群與家族》，臺南：臺南縣政府，

陳鴻圖的專書《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是臺南縣文化局的「嘉南大圳史料調查及蒐集」計畫的成果，計畫涵蓋的對象包括嘉南大圳、大圳興建前的大、小埤圳、日本領臺後的公共埤圳、以及戰後的白河水庫、曾文水庫等，計畫的目的在保存嘉南大圳及嘉南水利會之相關文獻資料。全書的主要內容分為：清代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嘉南大圳及曾文水庫的興建、和水利組織的變遷三個部份。在清代嘉南平原的水利開發一章中，作者指出嘉南平原的拓墾者及官府為克服該地降雨集中、河川不易利用的環境缺點，開發了多達 162 處的埤圳，盼能收取水利之功，但普遍規模小且運作缺乏效率，結果是「埤多圳少」、「臺、嘉二邑旱田居多，無隄防溝渠之利。」在嘉南大圳及曾文水庫的興建一章中，作者指出日本領臺之後，為推行米糖增產政策進而改善水利環境，初期先以公共埤圳的認定對舊有埤圳進行整合，再以國家力量進行官設埤圳工程，於是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以半官半民的方式於 1920 年開始興建嘉南大圳，歷時十一年完工，是當時經費最高、工時最久、過程最艱辛、灌溉面積最大，也是嘉南平原唯一的水利建設。第三部分討論嘉南平原水利組織的變遷過程，作者指出水利組織從清代的民營，到日治時代半官半民，至戰後逐漸官營化，這些組織變遷的動力，主要來自水的功能在逐漸轉變，而水功能的轉變使其價值更高、更多元化，累積的資源更為可觀，導致各方的覬覦，水利組織只能不斷在政府與農民間斡旋、轉型，顯示水利、組織、和環境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不斷變動的。⁴⁰

（二）族群和聚落

陳秋坤的〈帝國邊區的客莊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論文主張：帝國國邊區的土地墾闢，可以反映政治經濟勢力的運作以及移民墾佃落地化（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在論文中，作者強調的是帝國邊區的比較視野之觀點，以分析清代屏東平原客庄聚落的二項重要社會特徵：一、地權的持有公共產權，嘗田和神明會份田約佔總田地面積的 70-80%，二、客庄聚落從 1700 年代發展出「六堆」半軍事化組織，結合村庄管事、宗族領袖、家族長老等掌管田業和社會救濟組織的菁英，形成一股事機的政經勢力。透過屏東平原客家族群的拓墾歷史，作者認為客庄先民先以佃戶身份，向閩籍的不在地地主佃耕草地，形成「閩主客佃」的租佃生產關係，然後再運用投資工本改良土地的途徑，取得永佃權，轉化為田主階層。得利於屏東平原的豐富地下水源，六堆客庄聚落的田地迅速水田化，然而頻繁且長期的閩粵分類械鬥事件，造成村庄之間的緊張關係，促使客莊聚落重視村庄的半軍事化聯盟組織（六堆）。在村庄內部由管事統籌土地稅務，監督土地買賣，避免田業流入異籍人群手中。家族組織則利用廣大的公業田地，提供租息舉辦崇拜祖先儀式，聯絡宗親情誼，同時投資神明會和慈善組織，建立泛村庄的族親關係。作者的

2009，頁 138-249。

⁴⁰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

結論是：家族嘗會公業，管事和六堆聯盟等於是族長、庄長、和村庄菁英為一體的文化權力網絡，有機地將屏東平原的客庄社會凝聚在一起。⁴¹

洪麗雯在〈馬稠後聚落的拓墾與祭祀圈之建立〉中指出，八掌溪中游的馬稠後聚落，早在明鄭時期做有客家族群循八掌溪進入開墾，並於 1847 年在王得祿的主導下，建立莊民的信仰中心—馬稠後關帝廟。1855 年為凝聚信眾虔心，結合地方人力，由臺灣鎮標中營守備曾飛龍出首，將信眾部落區分為天、地、人、和四角頭輪流祭拜，並將其主管隆恩莊租中的「隆恩莊定抽租段」不在應收額徵內者，獻給關帝廟以為香油，長奉勿替。這是馬稠後已逐漸脫離初期移墾社會的狀態，進入以貢生、總理等地方頭人所領導的漢人文治社會，而其祭祀圈組織除了原有的客籍人士為信仰的主體人群外，也加入部分福佬人，成為跨族群、跨區域的信仰，也是莊民產生認同地方情感依附的憑藉。⁴²

林俊彬的論文〈清代枋寮地方的族群與聚落發展〉，在討論位處山海交逼且為帝國邊陲的清代枋寮地方，影響其聚落形成與市街發展及族群分布的地理、歷史因素。作者採取地理的研究途徑，企圖解明清代枋寮地方區域特性的形塑機制與發展過程，焦點置於族群與市街等兩項顯著試題上，結果顯示不同族群的聚落各自集中，濱海至內陸為閩系漢人所居，平埔聚落則分布在沿山地帶；至於枋寮市街則因兼具「資源優勢」、「陸路節點」與「邊防要地」的重要地點與位置條件，早在乾隆中葉即已形成。由於山海交逼的形勢，枋寮地區腹地狹隘，「族群三層制」的族群隔離政策只有三層之名，而無隔離之實，臺灣南部平埔與福佬的關係，普遍比平埔與客家的關係和睦的事實，使得早期入墾的客家勢力逐漸淡出，造成平埔住沿山，福佬住海邊的結果，而且地方的領袖人物多需同時具有福佬與番格的雙重族群身份，具體反映出清代枋寮地為的區域特色，是由自然環境、族群牽動與國家施為等三大脈絡，所共同交織形塑而成的結果。⁴³

黃曉琪〈清代十八重河流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研究急水溪上游近山地帶的開發。十八重河流域包含白水溪、六重溪和龜重溪，流域內的地形崎嶇，河道蜿蜒曲折，地勢東高西低，流域內土壤易受沖刷流失，且蓄水性不佳，農業發展受限。區域內族群複雜，哆囉囑社、蕭壠社、大武壠派社、麻豆社與漢人混居其間。研究者整理民間古契書資料發現，十八重河流域內各不同支流之間的地權形式才明顯差異，白水河流域沒有番租土地，地權全在漢業戶手中，地權轉移也只在漢人之間進行，多方杜賣形式，處分原因多為金錢不敷應用；六重河流域有番租，但番地的實際使用權掌握在漢人手上，番地地權因而「空洞」；龜重河流域土地大多帶有定額番租，不僅租額甚低且其租額長期沒有調整的現象，無法保障收租者的經濟不虞匱

⁴¹ 陳秋坤〈帝國邊區的客莊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1890）〉，《臺灣史研究》，16：1（2009.3），頁 1-29。

⁴² 洪麗雯〈馬稠後聚落的拓墾與祭祀圈之建立〉，收入簡文敏編，《2009 南臺灣歷史與文化研討會》，高雄：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09，頁 145-164。

⁴³ 林俊彬〈清代枋寮地方的族群與聚落發展〉，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

乏，平埔族雖一再企圖維護土地權利，但仍然經常被迫放棄土地實權而流失土地。⁴⁴

邱坤玉〈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地區漢人開墾之研究：以陳超家族為例〉以陳超家族在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地區漢人的拓墾區域為研究主題。佳佐地區在清初隸屬港東上里，位於東港溪以南地區，原來是鳳山八社中的力力社和加藤社的活動範圍。就地理位置而言，佳佐位處潮州斷層線邊緣，東有大武山，南有沖積扇平原，西側為六堆的客家「先鋒堆」—萬巒，北臨平埔族的赤山、萬金和加匏朗。1720 年左右來自廣東饒平新墟縣長彬鄉操潮汕語言的「吳陳」家族，從崁頂、潮州、四春、泗林，一路推進到佳佐地區，夾雜在平埔族、傀儡山的山地原住民與「六堆」客家族群之間，建立聚落進行拓墾。研究顯示吳陳家族渡臺的推力是原鄉生活困苦，來到佳佐地區的拉力似與施世榜之招佃拓墾廣大草地有關，而屬潮汕系漢人的吳陳家族帶來其鄉土神明三山國王，建立「佳興宮」。直到日治糖業發展時期，透過土地仲介關係，建立家族的政經地位，進而從事政治、土地開發、經營商行，經濟發展達到最巔峰。因此家族枝繁葉茂，建立大片莊園，迄今吳陳家族子孫人口繁衍超過 2000 人，由於長期在地方經營事業，吳陳家族與閩、客、平埔、甚至山地原住民的關係都十分良好，所以其家族對於佳佐地區的地方事務，有很大的影響力。⁴⁵

劉相宜〈六堆地名與客家發展〉，探討六堆地區在經過客家人開拓後，在地名上的種種變化，並試圖解答客家人何時入墾下淡水地區、六堆如何形成並定位、範圍組織與功能為何等問題。作者利用地名引申討論六堆各地的地方開發、水利發展及分類械鬥，而惜的是文中除了重新整理一遍六堆地名的相關資料外，結論只有一再強調諸如年代久遠無法正確推測六堆範圍，村落地名會因行政區域改變而改變，分類械鬥的分類指標時有改變等等不確定性的主張。此外，作者又在論文的後半寫了六堆地名的「詞語演變」和地名與「客家文化」二章，在方法上屬於人文學科的內容，更讓本篇論文顯得突，給人前後不搭調的感受。⁴⁶

（三）家族與區域開發

謝英從的〈從山上鄉土地文書續探「大潭底莊」施琅租業〉一文，利用七張古文書探討臺南縣山上鄉的施琅租業，以及地名與地方開發歷史。作者從山上鄉土地文書的記載發現，大潭底八莊及椰樹腳莊確實存在施琅租業，並指出該處的施琅租業因早已過戶給陳慎端及石希盛，故日治時代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未將之列入，才造成大家對施琅租業的分布有錯誤的認識。作者進一步根據石萬壽對菜寮流域的開發之研究結果，推論施琅租業會出現在曾文溪中游的山上鄉，似乎與康熙 21、22 年間菜寮溪氾濫改道流向新港溪有關。菜寮溪原本可能由今山上鄉西南為灰窯溝流

⁴⁴ 黃曉琪〈清代十八重溪流域的開發與地權轉移〉，國立臺東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⁴⁵ 邱坤玉〈屏東縣萬巒鄉佳佐地區漢人開墾之研究：以陳超家族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⁴⁶ 劉相宜〈六堆地名與客家發展〉，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向曾文溪，溪水氾濫後在隙仔口改道流向新港溪，導致灰窯溝一帶的大潭缺水乾涸，潭底出露成爲新生地，恰逢施琅攻下臺灣，於是將這片新生地納爲施琅租業的一部分。⁴⁷

吳俊蔚的〈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爲例〉一文，貫串邊區開發、抄封租和家族三個主題，討論在清朝官方的族群隔離政策下，漢人拓墾家族如何因應與突破限制拓墾番地，並考證翁雲寬家族的縉紳化過程及所遭受的挫敗。研究指出清代抄封租多位於平地，約佔 52%，近山與淺山只合佔 48%，其原因就是地區多爲違法開墾的土地，所以易遭隱匿而免於查抄，作者根據由田調所得的「翁家大草埔契書」資料，論證翁雲寬家業在遭到抄沒之後，其子翁玉輝仍有財力在林爽文和陳周全案中，爲朝廷效力獲得軍功，顯示在之前的抄封翁家有所隱匿，而且就是將田產隱匿在番界外。然而翁玉輝在隨後遭到臺灣總兵哈當阿的糾舉，雖然由於乾隆表示寬大而未嚴處，但翁玉輝也走避彰化，不久過世，而整個家族也隨之沒落。⁴⁸

李宜真〈李氏宗族與近代臺南學甲地區之發展〉，結合家族史與區域開拓史，以學甲李氏宗族由一介白丁，發展至學甲的地方領導家族的努力經營過程，作爲了解學甲區域發展的一個側面。文中以李氏宗親在學甲地區的產業、教育、宗教與政治等四個層面的參與，一方面呈現一個家族如何把握契機，追求在社會階層上的向上流動，一方面展現地方水利設施（嘉南大圳）、重要產業（碾米、商業）以及交通運輸（糖鐵）對於區域的重要貢獻。⁴⁹

（四）產業與區域變遷

簡炯仁在〈清代枋寮軍工廠與枋寮地區的開發〉文中指出，枋寮地區在清代爲「番界」所在，又曾經設置過鳳山縣軍工料廠，此一條件吸引大批人力進駐枋寮地區，催促當地的開發，這是乾隆中葉以前，枋寮地區的聚落形成，全境已經進入全面開發狀態的主要原因。枋寮地區的舊地名，除了大武力、大崑麓係以原住民的地名成庄外，其他都以「寮」命名，就是因爲和軍工料有關。作者進一步指出軍工料採集是眾多工作性質的組合，不同性質的工作者以不同的比例組合於不同的聚落之中，造成當地的聚落各具不同的功能。此外，作者認爲北勢寮是具備客家況味的地名，水底寮的領路頭有客家或的八角形福德亭，以及佳冬鄉賴家村三山國王廟內的福德正神神牌上，標註著大郡麓、大武力、番仔崙及北支尾的福德正神，顯示賴家村居民都由這四個村落遷來，可見當年設立枋寮軍工廠時步，應該吸引不少客家人進入，拓墾六堆的「左堆」。至於日治時代在籍漢人鄉貫調查所得枋寮幾乎全爲漳

⁴⁷ 謝英從〈從山上鄉土地文書續探「大潭底莊」施琅租業〉，收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第三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2009，頁 165-196。

⁴⁸ 吳俊蔚〈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爲例〉，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⁴⁹ 李宜真〈李氏宗族與近代臺南學甲地區之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州人的結果，應該是後來族群異動所造成的。⁵⁰

許晉誠〈新市鄉地方發展之研究〉，從地方發展的觀點出發，針對新市鄉的社會環境作分析，以研究 60 年來新市鄉的整體變化。由於新市是臺南科學園區的所在地，所以本文有一大半的內容在討論臺南科學園區對新市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有否臺南科學園區的進駐，新市的進步是非常明顯的，這些進步顯現在新市鄉的產業逐漸轉變成以工商業為主，家庭結構逐漸變成每戶平均 5.15 人的「折衷家庭」，年齡結構日趨高齡化，村里發展受交通道路支配，市街鬧區由仁愛街與中興街交角的永安宮前南移至仁愛與光華街 十字路口一帶等各個層面上。而臺南科學園區的進駐並非創造新市進步的原因，但對新市的產業類型之轉型有所貢獻，只可惜臺南科學園區進駐 13 年來，並未見到「社區融入」的現象，與當地社會互動冷淡，讓神州形成一個新的「圍籬城鎮」，值得各級政府重視。⁵¹

官彥君〈南靖糖廠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以嘉義縣水上鄉南靖糖廠週邊地區為例，從地方產業的角度切入，討論產業發展與地區社會文化發展的關聯性，作者選擇「時間節奏」作為討論的主軸，進入南靖地區各個聚落的歷史文化脈絡中，從人與空間、時間的關聯，探討居民在時間的節奏裡，所衍生出的生活規律。研究指出南靖地區的農民原本配合大自然的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東洋製糖株式會社於 1908 年在此設立新式製糖工場之後，居民的生活方式開始改變，隨著工廠的運作，進入「機械時間」當中，廠區內是輪班、輪休的時間系統，廠區外則隨「廊動」、「廊煞」的節奏而生活，一直到 1980 年代，臺灣糖業的風光不再，以糖業發展為中心的生活節奏，才失去對南靖地區居民的控制。⁵²

吳佩諭在〈澄清湖及其周邊空間的歷史變遷〉文中指出，澄清湖舊稱公爺陂、赤山大埤、大埤、大貝湖，原本是鳳山及赤山一帶的灌溉陂塘，但供水量有限灌溉田甲不多，1837 年修曹公圳時下淡水溪水引入大埤，成為帶動高雄地區水田化的重要水利設施，直至日治末期，為了太平洋戰爭，日本政府成立「高雄工業給水場」，大埤再度扮演不同角色，成為工業用水的水源地，戰後臺灣自來水公司再將大埤湖的供水改為民生用水，這一連串的角色轉換皆以供應水資源為主軸。由於有湖光山色，又因水源地長期受到保護，優美的景色吸引國民政府黨政高層的眼光，在「侍從主義」的政治氛圍下，大埤湖成為臺灣眾多的蔣氏「行館」之一，具有特定符號與象徵意義，連名稱都被雅化成為「澄清湖」。論文的重點即置於在此一特殊的經濟與政治機能運作下，澄清湖周邊的土地利用呈現何種特性。結果顯示澄清湖周邊的土地利用發展，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一、水資源與時變遷之利用，二、為滿足執政特權的公部門開發，三、綠帶變金帶的私部日房價炒作。澄清湖及其周邊空間的變遷歷史，呈現臺灣優質的公有土地，容易被少數共同利益團體，假借國家名義私下佔用公開享有，而戕害少數民眾權益的可悲政治現實。⁵³

⁵⁰ 簡炯仁〈清代枋寮軍工廠與枋寮地區的開發〉，《臺灣史料研究》，33（2009.6），頁 2-33。

⁵¹ 許晉誠〈新市鄉地方發展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⁵² 官彥君〈南靖糖廠與南靖地區社會文化的變遷〉，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⁵³ 吳佩諭〈澄清湖及其周邊空間的歷史變遷〉，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謝金財的〈「籬筐會」與阿公店（岡山地區）聚落關係之研究〉，在釐清傳統市集「逐日為市」與「逢節為市」的差異，及「逢節為市」的農村市集，與市稱發展及腹地的農村生活之間的關係。作者首先指出傳統朝滿夕虛「逐日為市」的市集，交易商品多為日常生活消耗用品，規模小且交易時間短，無法提供農村耐久性消費用品，因此才有在特定日期以「趕會」型式出現的「逢節為市」市集，其所謂的「節」是指為當地居民所敬拜之神明的節日，因此市集地點多選在寺廟道觀，市集也具備交易會期較長，市集規模較大，貨物較豐富多樣，且以耐久性用具為主等特色，所以「逢節為市」的中地等級，反而較「逐日為市」的中地等級為高。阿公店的「籬筐會」具備「逢節為市」的高級中地之各項特徵，這是因為阿公店有壽天宮這座祭祀媽祖的大廟宇，又是南北官道和東西向阿公店溪水運的交會等三項優勢條件所造就，因為交易物品以居家使用的竹篇籬筐為主，故名，每年的三月二十三（媽祖生）、八月十四（土地公生）、九月十五（阿公店義民節）三天為趕會日，是附近農村居民重要的休閒假日。但隨著社會經濟轉型阿公店的「籬筐會」雖然仍然持續舉辦，由於失去原本的社會意義，已經逐漸庸俗化，與鄉間的一般夜市無異，如何重新賦予社會意義，才是阿公店的「籬筐會」能否再造的關鍵。⁵⁴

王婉婷〈戰後臺南縣東山鄉的農業土地利用與變遷〉，以民國六十年代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原本的農業結構面臨重組為背景，選取典型農業生活型態，且位居丘陵、平原交界處的臺南縣東山鄉為個案，研究農業土地利用及變遷情形。東山鄉地形有五分之二為平原，五分之三為丘陵地，農業土地利用明顯受到地形影響，故作者將研究區分為平原區和丘陵區兩區分別討論。平原地區以嘉南大圳為界，大圳以西之農地，其灌溉用水來自嘉南大圳（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一年供應兩次稻作灌溉用水；大圳以東之灌溉用水來自白河水庫，為單期作田。平原地區的土地利用早期主要為雜糧和水稻，後期則是水稻及蔬菜。研究發現，受灌溉設施的影響，嘉南大圳兩側地區因為灌溉供水不同，導致兩地農業發展呈現差異。除了灌溉水源的影響以外，由個案訪問得知，影響農民選種作物的因素包括：臺灣整體的經濟發展、農業政策，以及農民性格、農作利潤和銷售管道。丘陵地區則依農民習慣及耕作作物不同，分為淺山地區及內山地區。淺山地區的土地利用主要為龍眼和柳橙，內山地區的土地利用為龍眼、椪柑及咖啡。除了因地形坡度等自然因素外，影響農民選擇作物或經營方式的主要原因則是人力不足與年老力衰。因高度、坡度、水源及農民性格、人工、利潤、銷售管道等因素不同而導致淺山及內山地區農業發展呈現區域差異。⁵⁵

李幸育在〈玉井的地方發展與聚落變遷〉論文中，基於對區域研究是為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生活間，人地互動與空間變遷的過程之認識，因此以土地利用、產業轉變、聚落分布、人群互動關係作為觀察的指標，深入探討自漢人入墾以來，玉井地區的地方發展。玉井位於臺南府城東方的近山邊區，開發較晚，而河流地形

⁵⁴ 謝金財〈「籬筐會」與阿公店（岡山地區）聚落關係之研究〉，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⁵⁵ 王婉婷〈戰後臺南縣東山鄉的農業土地利用與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9。

則範限了市區的發展方向，也主導了各個被分割地區之間的關係，形成宗教活動中的「溪南中壇元帥，溪北玄天上帝」所顯示的社會空間組織之基調。從與國家關係的角度觀察，清代的族群隔離政策造成玉井發展停滯，也為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埋下伏筆，然而因為事件而大批進入山區兵力，卻為往後的糖廠、鳳梨合同工場、油礦採掘等近代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理想的治安條件，也直接間接地促進了地方的繁榮。⁵⁶

（五）區域開發與社會變遷

林俊霖的〈佳里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1623–1945）〉，以佳里鎮為研究區域，進行聚落、經濟、信仰等三個方面的探討，藉以了解地區發展的脈絡。由於歷史的發展和地理環境的差異，佳里鎮可以區分為將軍溪以北的佳里興、臺江濱海以北的蕭壠和臺江濱海浮覆地等三個區域，佳里興因曾為諸羅縣城而著名，蕭壠則因物產豐富兼有海運之利，早在康熙末年已經發展成市街，只有臺江濱海浮覆地長期維持以旱作為主的農村景觀，而日治時代明治製糖在佳里興設立工場，則為佳里升格為街奠下基礎。在區域差異的影響下，佳里鎮的宗教信仰亦分成三區，佳里興的震興宮以「八甲十三庄」的佳里興香聞名，蕭壠金唐殿的蕭壠香更是南臺三大香之一，至於臺江濱海浮覆地的居民則參與西港仔香，一鎮三區的發展，具有相當的獨特性。⁵⁷

簡佳華〈里港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以里港地區聚落的形成過程、角頭廟宇的興建年代、人口的分布與組成、產業結構的改變等為指標，探討里港地區的社會變遷，作者指出里港市街形成的原因是具備河港機能，聚落與廟宇的分布及信仰主神的區域差異，即為里港發展受河川影響的具體反應，而1761年下淡水縣丞移駐，對里港的發展也十分明顯。然而隨著河港機能衰退，臺灣經濟結構改變，以及高級行政機能消失，里港在屏東平原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在失去內因性的發展動力後，區域內的社會發展遂由聯外交通道路以及河川堤防整治所主導。⁵⁸

（六）城市建設或都市計劃

石萬壽的論文〈嘉義城之建置〉在研究與嘉義城垣增修改建之過程，並透由嘉義城與臺灣其他各城的比較得出一些特色，藉此析論歷史上嘉義城多變亂的原因。作者經過詳細史料考證後指出：原名諸羅城的嘉義城，具有下列幾項特色：一、為最早建立的城垣，二、建城所用材料每有創新，且領先全臺各城，三、城區範圍每經修建即有增加，四、各門城樓之建置為臺灣各城最早，也是唯一在城樓上奉祀神祇者、五、建城時已規劃排水系統，為排水系統較完善者，六、防城守將官階由參

⁵⁶ 李幸育〈玉井的地方發展與聚落變遷〉，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⁵⁷ 林俊霖〈佳里鎮的開發與社會變遷（1623–1945）〉，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⁵⁸ 簡佳華〈里港地區聚落發展與社會變遷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將降為守備，守城之兵力也不增反減，趨勢恰與府城相反。由於兵力減少，再加上嘉義城內缺乏郊商組織，不像府城的郊商實力強大，可與官府抗衡，民怨得以透過郊商反映疏解，因缺少官民溝通管道，故終清之世，嘉義城一直無法避免戰亂。⁵⁹

李岳倫的〈府城(臺南)南門外土地使用的歷史發展〉，以各時期的地圖、文獻資料以及圖像資料，來討論臺南府城南門外土地利用的變遷。臺南府城的南門外，在清初原本被作為墳墓用地，包括一般人民的墓塚以及官方的義塚，這些墓地成為點綴在其間的小村莊彼此間的障礙，由於生活上的不便，最後導致這些村莊消失。日治時代，臺南市實施市區改正、都市計畫，針對南門城外的墓葬進行遷葬，改葬後的土地為官有土地，殖民政府因此將這些新重劃的土地，規畫為公共設施用地，尤以機關學校為多，如體育場、體育公園等，使南門外原本荒涼且墳塋處處的廣大墓地，轉變為教育與體育用地，展現出活力與知識的一面。戰後雖然延續日本時代的都市規劃，但因空軍供應司令部進駐臺南機場，南門外因此多出了空軍眷村社區，著名的都市更新案例－水交社細部發展計畫，正是這批老舊眷村的改建行動。⁶⁰

林立浩〈荷鄭至清初臺南市街形成與建築類型之研究〉，以歷史地圖檢視臺南市的空間結構形式，進一步街廓與建築類型的功能關係。首先從歷史背景觀察作為市鎮空間與建築的意義，其次以街道網絡、街廓、建築類型的連續階段等面向，詮釋市鎮的空間型態和規劃理念。研究結果顯示最早的大員市鎮與明鄭的赤崁聚落，其街廓的原始形態至今仍然留存，街廓是構成市鎮主體的元素，街廓與民居發展是理解市鎮起源與進程的關鍵要素。大員市鎮的街廓為規則的格狀組織，由城堡到廣場再到市鎮所串連列成的軸線，旨在呈現殖民統治的階級性。荷蘭人希望一方面建立具有代表典型殖民市鎮的形像與體現荷蘭城市的樣貌，另一方面試圖規劃理想的商業城鎮平面與建築的創新。赤崁聚落則為漢人的街坊格式，是以十字大街為軸心的放射狀組織，其四向街坊分別規畫為北方軍事、南方文教、東方居住、西方商業與作坊等不同的機能區。⁶¹

六、全島範圍但具區域特性

過去類似的題目多被歸納在經濟類進行討論，但這次被分在區域史進行回顧，因而個人將這些主題界定為「全島範圍但具區域特性」性質。2009年這類主題的論著計有9種，就論著性質來看，專書和論文集有3本，學位論文有4篇，一般性論文有2篇；就研究主題來看，有6種論著和開發課題有關，包括農業、水利和土地開發，另有3篇和氣候、城市有關。

⁵⁹ 石萬壽〈嘉義城之建置〉，《臺灣文獻》，60：2（2009.6），頁151-180。

⁶⁰ 李岳倫〈府城(臺南)南門外土地使用的歷史發展〉，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⁶¹ 林立浩〈荷鄭至清初臺南市街形成與建築類型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9。

（一）開發史相關

2009 年有 3 種論著和水利課題有關。陳鴻圖的《臺灣水利史》，作者期望以「詳古略今」、「時空兼具」原則，對清領時期和日治時期的水利發展多些著墨，戰後的水利發展則以政策和個案介紹為主；書中注重臺灣各區域自然環境和水利發展的差異，希望釐清各區域的時空差異及小區域的水利發展特點；全書架構除參考書目及附錄外，共分成十章，分別為史料介紹、研究回顧、臺灣各地區地理環境的差異、早期的水利開發、清領時期的水利事業、日治時期埤圳的公共化、桃園大圳和嘉南大圳、戰後水利組織的變遷、水利開發對自然環境的衝擊等。⁶²

蔡明華、林尉濤編的《臺灣灌溉史》，係針對 2004 年的第一版增修補漏，此增補本最大的特色即針對近年來農業的調整及氣候的變遷，將所有資料、數據均修訂至 2007 年。本書的前半部介紹臺灣的地形、河川、氣候、雨量對農業灌溉條件的影響，後半部則說明臺灣近代產業的發展、臺灣歷史上灌溉排水事業的演變。由於本書係農委會的出版品因此除了對臺灣的灌溉史有全盤性的介紹外，也有「未來展望」一章，特別說明了政府最新的農業政策。⁶³ 本書和陳著的《臺灣水利史》雖探討主題相同，但前者偏重在農田水利事業和水利會的功能和演變，後者則偏重在水利開發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黃富三主編的《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一書，為 2007 年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論文集結出版，本次研討會主要探討：（一）海洋與臺灣聚落：主要說明海洋對臺灣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貿易，臺灣產業因貿易而發展，聚落從此出現，並出現大城市；（二）河流與臺灣聚落：則是說明河流對臺灣聚落的影響最大，尤其在清代；（三）比較性案例：是有鑑於臺灣是個小島，其發展高度受外在因素的影響，因此有必要瞭解世界其它地區的情形，藉此比較異同。⁶⁴

蔡承豪在〈從在來犁到改良犁：臺灣的犁具改良（1900s-1960s）〉文中，探討犁農具在日治時期和戰後的改良過程。臺灣犁具改良的過程為：先引進包含蒸氣犁及鐵犁的西洋犁，但因臺灣的養牛習慣而效果不佳。再者為混合犁的出現，如 1914 年大山柳平的可調整耕度深淺的大山犁、1913~14 年間末永仁以西洋犁為基礎的改良犁具。以及在 1922 年末永仁和磯野七平的改良下，出現第一批適合臺灣的改良犁。而後改良犁的再研究，除持續進行改良外，並引進日本深耕犁，其中磯野犁為最普遍的日本改良犁。另外還有官方改良犁的推廣。在地化的改良，則分為日治及戰後兩階段。日治時期有高雄武智農器具製作所為主的日人廠商改造，以及包含 1930 年周和泰的孔明犁、1933 年鳳山源成農具店的鳳山犁、改良磯野犁的鶯歌犁、嘉義民雄益利農具工廠林財的興農式深耕犁。戰後時期有在農事研究單位 1954 年張舉珊的舉珊式改良犁及 1964 年江天送的新式改良犁，民間研發則是以周源成農具店、寶信

⁶² 陳鴻圖，《臺灣水利史》，臺北：五南，2009。

⁶³ 蔡明華、林尉濤編，《臺灣灌溉史》，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

⁶⁴ 黃富三編，《海、河與臺灣聚落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工業及協進鐵工廠三家公司為主。⁶⁵

黃俊凌的〈抗戰時期福建臺灣籍民在崇安的墾荒研究〉一文，係針對抗戰時期拒絕回臺而被安置在福建崇安的臺灣籍民進行研究。過去對崇安臺灣籍民的研究成果有二：一是臺灣籍民是在福建省政府制定「移民墾荒辦法」後，才被有計畫的送往崇安；二是臺灣籍民在崇安墾務是受到集中營的待遇。然而，本文作者利用《民國時期崇安縣檔案》資料，藉以推翻過去既有的研究成果，認為在評價臺灣籍民墾荒意義時，不能僅著眼於墾荒失敗的客觀效果，還要看到其背後更深層的賑濟目的，說明福建省政府對安排進行臺灣籍民墾荒一事，並非既有安排，亦非集中營式的管理。⁶⁶ 此篇論文雖運用過去研究者沒有使用的檔案，但只依賴官方檔案，而沒有佐証相關人士的口述歷史，使得翻案略顯薄弱。

饒宇婷的〈聯合國與臺灣海埔地建設及其成效〉論文，以 1950、1960 年代的海埔新生地開發為例，分析聯合國援外機構與中華民國的互動關係，探討技術合作的外交斡旋與成效，尤其著重在外籍專家報告中的行政機構與政策擬訂問題，以及政府的回應，希望對臺灣與聯合國間的非政治性關係之研究有所突破。在結論中，作者更指出臺灣這幾年在國際舞臺或亞太地區的地位漸行孤立，外交環境惡劣，在兩岸外交競爭的敏感政治議題下，當今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時嘗試如何突破外交困境、推動重返聯合國，以及加入其他國際性組織。但是在政治議題之外，或許更應該瞭解國際組織存在的意義，試著推動國際合作。⁶⁷

（二）氣候、城市

陳筱蘋的〈由二十四節氣看北臺灣的氣候變遷〉⁶⁸ 與胡敏玲〈由二十四節氣看南臺灣的氣候變遷〉⁶⁹ 論文，取 1901~2007 年的氣候資料平均值，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點來分析北臺灣和南臺灣的氣候特徵及氣候變遷。研究發現：（1）溫度的變化較具一致性：平均溫、最高溫、最低溫氣候值的最大值都落在「小暑」節，最小值都落在「大寒」節；（2）北部日溫差氣候值最大值大多出現在颱風季節氣，最小值則無一致性；南部則最大值與最小值皆無一致性；（3）北部平均雨量氣候值最大值出現在梅雨季和颱風季節氣，南部主要落在「立秋」節及「大暑節」；北部最小值出現在「小雪」節、「大寒」節和「小暑」節，南部最小值出現在「小寒」節，至於長期的趨勢並未有明顯的增減現象；（4）平均雨時氣候值最大值，北部出現在「小滿」節、「雨水」節、「立冬」節，南部出現在「小滿」節和「大暑」節；最小值北部出現在「小暑」節，南部出現在「小雪」節；（5）相對溼度氣候值最大值，北

⁶⁵ 蔡承豪，〈從在來犁到改良犁：臺灣的犁具改良（1900s-1960s）〉，《師大臺灣史學報》，2（2009.3），頁 161-214。

⁶⁶ 黃俊凌，〈抗戰時期福建臺灣籍民在崇安的墾荒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03（2009.3），頁 79-90。

⁶⁷ 饒宇婷，〈聯合國與臺灣海埔地建設及其成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⁶⁸ 陳筱蘋，〈由二十四節氣看北臺灣的氣候變遷〉，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⁶⁹ 胡敏玲，〈由二十四節氣看南臺灣的氣候變遷〉，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部出現在「小滿」節、「驚蟄」節，南部出現在「立秋」節；最小值北部出現在「小雪」節、「小暑」節，南部則只出現在「小雪」節。

陳亮州的〈清代臺灣城市的建置與治理—以府縣廳治為中心〉一文，旨在從清代臺灣府縣城的設置，分析清廷對於臺灣這樣新拓地區的城市，採取何種態度，如何發展成具有城市的規模，並由硬體建設與城市管理，分析官方與民間所扮演的角色，以深入背後的經濟與社會力量。作者認為清代臺灣城市的選定、城池與官署的建設、軍事佈署，與地方行政體系緊緊結合，在中央集權政治運作下，明顯的具有配合國家政策的傾向。形塑城市的驅動力，如城市的設置與城牆的建築，決策於遙遠的北京。清縫基於施政與控制的要求，來定位臺灣城市，城市在行政區中，主要扮演控制的角色，而不是提供服務、推動社經發展。城市的戰略價值，必須置於臺灣城市的體系中才能展現。但是，城市發展所需的資源，則是驅動地方資源來投入。城市作為一個生活空間所需要的條件，相對的被忽略，歸屬於民間自治事務。⁷⁰

七、結語

綜觀 2009 年度臺灣區域史的研究成果，有三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學位論文是區域史研究的主力；二是系所發展方向和臺灣史研究課題關係密切；三是金門研究成果慢慢浮現；四是族群、沿山聚落、水利與環境的課題持續受到關心。前兩個特點和研究生背景、系所發展方向有關係，39 篇學位論文中，有 19 篇的作者是就讀在職專班，或具中、小學教師身份。⁷¹ 首先，在職進修及小、中學教師的背景及使命感，對論文題目的選擇以家鄉或服務地為對象，或以地方產業與區域變遷的關係為主題，是相對比較容易進行的課題；其次，臺灣研究相關系所大多是設在原師範體系的學校中，鄉土和地方的關懷，本來就是這些學校的職志；最後，系所開設的課程，對研究生的訓練有絕對的關係，表一是 96 學年度到 98 學年度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東華大學鄉土所（已更名為臺灣文化學系）、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三所學校開設區域史相關課程一覽，一學期研究所的課程平均大概 6-8 門課，區域史相關的課程最少都佔 1/4 以上，在課程的耳濡目染下，研究題目的選擇就很自然往區域史發展。

2009 年離島的研究，很特別的是三種論著是以金門為對象，澎湖研究只有一篇碩士論文，一年的成果很難論斷原因，但金門研究興起應和 2006 年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的設立有關，該所的設立宗旨「結合學校與地方資源，推動閩南文化及其相關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以金門為核心，擴及廈門、泉州、漳州以及臺灣、南洋

⁷⁰ 陳亮州，〈清代臺灣城市的建置與治理—以府縣廳治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9。作者博士論的封面畢業時間是 2008 年 1 月，內頁學位審定書是民國 98 年 1 月。

⁷¹ 分別是李禮仁、莊育忠、林宏仁、陳筱蘋、胡敏玲、張泓斌、吳歆婕、黃啟祥、甘國賢、黃素真、李宜真、李岳倫、官彥君、邱坤玉、黃曉琪、簡佳華、李幸育、吳佩諭、孫秋茹等。

閩南文化之跨地域比較研究，並面對閩南文化的歷史保存與現實發展的課題，透過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研究，培育閩南文化研究人才與文化產業經營人才。」可以預期的的是金門和閩南相關的研究課題會呈現穩定的成長。

族群、沿山聚落、水利與環境等三個課題，在 2009 年的研究成果中佔一定份量，很明顯的這和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推展有關，對此，中研院臺史所應該再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林文凱在「2008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回顧土地拓墾、水利開發與商業發展領域時，提及 2008 年度此領域的研究成果有幾個特點：一是數量比往年增加；二是有新議題的出現；三是學位論文仍然過度零碎化，未能從區域現象的討論中抽繹出重要的概念與理論議題，而容易淪為史料的堆砌。並建議透過清代中國史與日本帝國史的適當參照與對話進行適度的「外向化」，這樣臺灣史研究才能發掘新的議題，認識到新的研究方法論，並且引發其他學術場域的研究者對於臺灣史研究的興趣，從而讓臺灣史學界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貢獻於其他學術場域。⁷²

就 2009 年度臺灣區域史的研究成果來看，其所呈現的特色，和林文凱在去年的觀察結果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零碎化和「內捲化」的程度更顯著，小區域的地域社會研究趨勢更加明顯。格局過小、零碎化、不夠細緻的特點依然存在，此現象或許令許多學者憂心，但對應前述「族群、沿山聚落、水利與環境」的研究趨勢，中研院臺史所如更積極的往外播種，如幾年前和中正大學合辦的「臺灣史研究研習營」等類似活動，且焦點集中在「跨領域、理論與方法、新趨勢及新課題」等面向，相信在幾年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會議中，一定可以看到些許的研究成果。

⁷² 林文凱，〈2008 年度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二）：土地拓墾、水利開發與商業發展領域〉，「2008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政治大學，2009 年 12 月 17-18 日。

表一、96 至 98 學年度臺灣相關研究所區域史課程開設一覽表

年度	學校	系名	課名	授課老師	學分數
96-1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南部區域史研究	吳進喜	2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區域經濟史（中部地區）	張素玢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區域開發與族群關係	賴志彰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村落考察與都市研究	賴志彰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臺南的廟宇與廟會	朱榮貴	2
96-2	臺南大學	臺文所	產業文化與農漁村發展	賴志彰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海洋環境與文化發展	賴志彰	3
97-1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南部區域史研究	吳進喜	2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東部區域史研究	詹素娟	2
	臺南大學	臺文所	村落考察與都市研究	賴志彰	3
	東華	鄉土所	地方文史編纂	潘繼道	3
97-2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區域經濟史（中部地區）	張素玢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臺灣居民調查專題	賴志彰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臺南的廟宇與廟會	朱榮貴	2
98-1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南部區域史研究	吳進喜	2
	臺南大學	臺文所	村落考察與都市研究	賴志彰	3
	東華大學	鄉土所	地方文史編纂	潘繼道	3
98-2	臺師大	臺史所	臺灣區域經濟史（中部地區）	張素玢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臺灣居民調查專題	賴志彰	3
	臺南大學	臺文所	臺南的廟宇與廟會	朱榮貴	2

資料來源：筆者調查。